

论皇甫湜、孙樵的古文特色与晚唐古文之衰落

安 赞 淳*

<目 次>

I. 引 言	2. 晚唐古文之衰落原因
II. 二人古文特色与晚唐古文之衰落	1) 文壇地位
1. 二人古文之特色	2) 二人古文及古文理論的缺陷
1) 尚‘文’	III. 結 語
2) 尚‘奇’	

I. 引 言

唐代古文运动到韩、柳就已经发展到最高点，同时在古文理论和他们的古文成就两方面都为他们以后的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即，不但为其后的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文体方面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典范。不过，唐代古文到了韩、柳之后逐渐衰落不振，直到宋代一批古文大家出现，方有所转机。

皇甫湜、孙樵二人都可以是在唐代古文运动史上韩、柳之后的佼佼者。不过由于他们二人的古文成就和理论上的缺陷，都无法成功地完成继续推动古文运动发展的任务，最后还是把古文的文坛主导地位拱手让给了当时的‘时文’-‘骈体文’。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古文之所以衰落不振的一切责任，都推到他们两人的身上，因为其实韩、柳所完成的古文本身也埋下了将导致古文衰败的种子。¹⁾不

* 영진전문대학 관광중국어통역전공 전임강사

1)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54，说：“古文运动至于韩、柳，已发展到最高点

过，这些问题不是本论文主要讨论的课题。只是想从皇甫湜、孙樵二人是韩、柳以后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他们古文及古文理论的探讨，观察晚唐古文的衰落原因与他们二人的关系。因此，笔者将对种种与他们二人无直接关联的晚唐古文的衰落原因，暂不予探讨。

我们认为皇甫湜、孙樵二人的古文作风大致上实践了他们的古文理论主张²⁾，因此，本论文将主要以其古文理论特色为中心进行讨论。另外，因为孙樵的古文理论大致因循皇甫湜的古文理论，所以探讨孙樵古文理论特色时，拟把焦点放在与皇甫湜的古文理论有所区别的部分上。

II. 皇甫、孙二人古文理论的特色与晚唐古文的衰落。

1. 二人古文及古文理论的特色

我们可以把皇甫湜和孙樵的古文理论的共同特色归纳到：1、尚‘文’；2、尚‘奇’³⁾两点。

1) 尚‘文’

我们看韩愈的古文理论虽然因为强调文辞的创新，所以有‘唯陈言之务去’⁴⁾、‘怪怪奇奇’⁵⁾等偏于‘文’方面的理论主张，但总的来说，韩愈的古文理论及他的古文创作实践都在兼顾‘道’与‘文’两方面，并不偏废，而且终究还是以文道并重为理论中心。但到了皇甫湜和孙樵论古文，可发现已公然标榜‘文’而不

同时便已有转移方向的暗示……本来一切物不能永久保持统一状态，否定自己而变成他物，是物的内在本质。”

- 2) 比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60，说：“皇甫湜，其文章文论便真的置重于‘怪奇主义’了”；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页42，也说：“皇甫湜作奇特，论文也尚奇。”等，一般专家都如此认为。
- 3) 这尚‘奇’就是尚‘文’的一种表现，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获得补充。
- 4) 韩昌黎文集校页98，〈答李翱书〉。
- 5) 韩昌黎文集校页328，〈送穷文〉。

夏强调道。

皇甫湜的论文主张可举〈谕业〉、〈答李生一、二、三书〉等四篇文章为代表。他的〈谕业〉篇先叙述他所认为的为文要略，然后再评论唐朝十家之文。〈谕业〉篇共提了四次‘道’，如：

- A、夫欲利其获，不若优其为获之方；若欲显其能，不若营其为显之道’。⁶⁾
- B、求诸人不若求诸己；驰其华不若驰其实……彼则巾车于名利之肆，我则冠履于文史之间。‘道’寝而后进，业成而后索。以其劳于彼，曷若勤于此。⁷⁾
- C、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关华簪……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⁸⁾
- D、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飏激浪，汗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⁹⁾

我们看，上面举的四个‘道’中，B条的‘道’较接近于韩愈所谓的‘道’，即指修养方面的‘道’而言，但我们仔细看这‘道’显然也不是儒家古圣贤之‘道’，而还是已偏于为文所需的修养方面的意思。

除此之外，文中所见的‘道’字，或指‘方法’，或指‘表述’等，皆未涉及儒家古圣贤之‘道’。而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为文之方’还是偏于‘文’而说的，至于所提及的‘道’也不是‘儒家之道’。因此他讨论唐朝十家之文，也从偏于‘文’的角度来评论各家文章的成就的。另外，他有〈答李生第一、二、三书〉¹⁰⁾三篇主要讨论的就是有关文论方面的内容，不过文中连一个‘道’字也没有提及。而我们从他文中所谓“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¹¹⁾看，可知他有意以‘理’代替了韩、柳所谓的‘道’。另外，他虽然提到了这一‘理’字，不过他在这三篇文章里面并没有发挥这‘理’的问题，而把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到‘奇’上面。

除以上四篇文论以外，可窥见他文论见解的还有，〈韩文公神道碑〉¹²⁾和

6) 《皇甫持正集》卷1，页7，四库全书本。
 7) 《皇甫持正集》卷1，页7，四库全书本。
 8) 《皇甫持正集》卷1，页7，四库全书本。
 9) 《皇甫持正集》卷1，页7，四库全书本。
 10) 《皇甫持正集》卷4，页3-8，四库全书本。
 11) 《皇甫持正集》卷4，页5，四库全书本。

〈韩文公墓志铭〉¹³⁾两篇，虽然这两篇并不是专门论文的文章，不过在对韩愈文章的评语中他也透露了些许论文见解。他固然在〈韩文公墓志铭〉中写道：

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及冠，资为书，以传圣人之道。

即点出了韩愈文章在‘传道’方面的贡献，但他除了这么一次一提之外，这两篇文章主要还是站在‘文’角度褒扬韩愈古文的成就，由而可以得知他对‘文’的重视态度。

孙樵的论文可举〈与王霖秀才书〉¹⁴⁾和〈与友人论文书〉¹⁵⁾作为代表，这两篇文章的重点与皇甫湜之文论一样也在于尚‘怪’‘奇’上。比如，他说：

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所不道，到人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¹⁶⁾

古之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¹⁷⁾

这是他两篇文论的主旨。此中“以之明‘道’”虽看似由皇甫湜的‘理’再回到‘道’上，所以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他又紧接着与‘名’相提并论，可见他所谓的‘道’在内涵层次上与韩、柳等古文运动先驱相比还是有差别，也有‘质’的变化。即，孙樵的这两篇主要从‘文’的角度而论文，表现了他重‘文’的倾向。

2) 尚‘奇’

前已提过皇甫、孙二人的尚‘奇’主张就是一种尚‘文’的表现。而此二人的尚

12) 《皇甫持正集》卷6，页1，四库全书本。

13) 《皇甫持正集》卷6，页6，四库全书本。

14) 《孙可之集》卷2，页6，四库全书本。

15) 《孙可之集》卷2，页7，四库全书本。

16) 《见孙可集》之卷2，页6四库全书本。

17) 《孙可之集》卷2，页7，四库全书本。

‘奇’主张是来自韩愈文章在此方面特色的发挥。《四库提要》与《文史通义》说：

- A、湜与李翱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¹⁸⁾
 B、湜与李翱俱称韩门高弟……翱得其正，湜得其奇。¹⁹⁾

可知，二文同样点出了皇甫湜文的‘奇’乃来自韩文的传承关系。韩愈的文章虽大部分都平易可诵，但也不可否认确有不少‘怪奇’的字句和题材。‘怪奇’确实是韩愈文的主要特征之一，但韩愈尚没有全力作‘怪奇’文章，‘怪奇’方面的文论主张也不是很突出的。²⁰⁾可到了皇甫湜、孙樵二人的文论则多着重在‘奇’方面的特色极为显著。以下从他们的文论观察尚‘奇’的主张。我们先看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一书〉上的尚‘奇’的主张：

- C、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²¹⁾

我们可把 C 整理为如下：

意新→异于常→‘怪’ \ 乃自然
 词高→出于众→‘奇’ /

我们从此可见，原来‘怪’乃主要指‘意’而言；‘奇’则主要侧重于‘词’而言，所指各有偏向。再看〈答李生第二书〉上的一段：

18) 见于《四库提要》卷150。

19) 见于《文史通义》页261，〈皇甫持正文集书后〉。

20)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60。

21) 《皇甫持正集》卷4，页5，四库全书本。

D、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²²⁾

这段就是撇开C所指的指‘意’而言的‘怪’，而专就‘奇’而所说的。我们若归纳 C 内容的重点，可得如下三点：

1) ‘奇’若非正而无伤于正 → 无伤于正 ↘
非常而出常 → 出于常 ↗ 尚之可

2) ‘文’是‘言’之‘华’者，它的目的则在于‘通理’。

3) ‘文’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从以上三点看，皇甫湜认为可尚的‘奇’很显然就是指言之华者而言的。

我们再看〈答李生第三书〉上的一段：

E、生云 奇与易，作者何别，在所为耳。请考之于实。生为易矣，试为仆作难，作难者视何如相如、扬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²³⁾

我们再把E 所叙述的内容也归纳为如下两点：

1) 从他‘奇’与‘易’以及‘难’与‘易’的对比看，他所谓‘奇’很可能就是指‘难’而言。

2) 他认为文之‘奇’与‘易’不是为不为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从以上所分析的C、D、E—分别是〈答李生书第一、二、三〉等具有系统性的文论看，皇甫湜的‘怪奇’论实际上就是尚‘奇’论，也就是主要就‘词’之高而

22) 《皇甫持正集》卷4，页8，四库全书本。

23) 《皇甫持正集》卷4，页6，四库全书本。

论,而他极力发挥的‘奇’论中的‘奇’实际上不外就是词之‘华’和‘难’。

如上所提,孙樵的论文主张与皇甫湜大致相同,一样有尚‘怪奇’的主张。孙樵在〈与王霖秀才书〉²⁴⁾中自述自己的文统说:

F、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

因为他为文的传承关系如此,所以它所说的‘怪奇’论也与皇甫湜大同小异。此举同中有异者如下:

G、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²⁵⁾

在G中,除了‘怪奇’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工’,因为皇甫湜并没把他所谓的‘怪’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也难以断定‘意新’的‘怪’与‘意深’的‘工’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二人均以‘词(辞)’与‘意’对比,此其一;孙樵在〈与王霖秀才书〉中又说:

储思必深,摘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²⁶⁾

此处孙樵又以‘思(也就是‘意’之意)’与‘怪奇’相对应,此其二。从这两点来看,孙樵所谓的‘工’与皇甫湜所谓的怪脱不了关系的。

24) 《孙可之集》卷2,页6,四库全书本。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也有与此几乎相同的话,可见他平常颇引以为傲。

25) 《孙可之集》卷2,页7,四库全书本。

26) 《孙可之集》卷2,页6。

2. 皇甫、孙与晚唐古文之衰败

1) 文坛地位

先撇开皇甫、孙二人的古文成就之高不高不谈，如果他们二人在当时文坛上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话，我们是无法把二人与晚唐古文的衰败扯在一起讨论的。正因为他们在当时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古文和古文理论倾向才可能影响文坛的风气，甚至导致晚唐古文的衰败。

我们现在可以从皇甫、孙二人的事迹、自述、他人对他们的论述等推知他们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先从他们的事迹看，长庆四年(824)韩愈因疾免吏部侍郎，写信告诉皇甫湜说：“死能令我所以不随世磨灭者，唯子以为嘱。”²⁷⁾即托皇甫湜为自己写碑志。当时韩愈以道统与文统自居，并主导文坛倡导‘古文运动’。以韩愈当时的身份地位嘱托皇甫湜作自己的碑志铭，可见韩愈对皇甫湜文章的推重和皇甫湜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即使皇甫湜当时在文坛的地位不很高，仅此一件就足以提高他的声誉和地位了。

再看《新唐书》的记载：

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大怒曰：“何遇我薄耶，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从而酬之”。²⁸⁾

可见，皇甫湜丝毫不让一代文豪白居易而相提并论，可见他以文自许的程度。而裴度对此也并不加以批评或否定，只说：“不羈之才也”。²⁹⁾可算加以肯定且重视。

再从他人对皇甫湜的论述看，白居易有<哭皇甫七郎中诗>说：

27) 转引自罗联添著《韩愈研究》，页190。

28) 《新唐书》卷176。

29) 《新唐书》卷176。

A. 志业过玄宴, 词华似祢衡, 多才非福禄, 命是聪明, 不得人间寿, 还留身后名, 涉江文一首, 便可敌公卿。³⁰⁾

由而可见白居易对皇甫湜的推许。再看后人在皇甫湜与韩愈的传承关系方面所下的评语：

B. 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 遽不及远甚。³¹⁾

C. 盖唐之古文, 自韩愈始, 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 学湜而不至者为孙樵, 自樵以下无足观矣。³²⁾

D. 湜与李翱俱称韩门高第……湜于韩门, 所得最为粗浅, 而又渐染中唐奇碎之病。³³⁾

虽然以上引文论及二人文章时, 其目的在于批评, 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他们对韩愈文章的传承关系, 我们从此也足以推知他们二人在当时文坛和古文运动史上的地位。

2) 二人古文及文论与晚唐古文的衰落

我们通过上文的讨论得知, 皇甫湜和孙樵二人在中晚唐时期古文运动的发展和传承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负此重担, 却难当大任, 晚唐古文所以衰败二人也难逃干系。当然, 除他们的因素之外, 古文运动内在因素的变质也是导致古文衰败的原因之一。³⁴⁾至于所谓“内在因素”的具体内容, 则本文不予讨论。

30) 《白居易集》页641。

31) 《新唐书》卷176。

32) 见于苏轼《谢欧阳内翰书》, 此转引罗联添《韩愈研究》页251。

33) 见于《文史通义》页261, 《皇甫持正文集书后》。

34)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54, 说:“古文运动至于韩、柳, 已发展到最高点, 同时便已有转移方向的暗示……本来一切物不能永久保持统一状态, 否定自己而变成他物, 是物的内在本质。”

笔者只想在这一层关系上讨论皇甫湜和孙樵二人古文及文论在这些质变中起到的消极作用。

(1) 二人古文及文论脱离了古文运动的主旨

我们如何对‘古文运动’下定义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很多不同意见。不过，综观其所归，即不外乎：在内容方面以儒家之道代替‘性情’，在形式方面则以‘简易’代替‘繁密’。³⁵⁾而我们在本论文第一节中探讨过：二人‘尚文’而不甚重视‘道’，且一味求‘奇’，而此‘奇’亦莫非是‘华’与‘难’。由此观之，他们二人所重视且极力追求的恰恰是当初韩、柳等古文所要反对的对象。

(2) 为二人才力所限，一味趋奇走怪为人所厌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二人力学韩愈，结果却是一味趋奇走怪，又未能达到自己所追求的‘奇’与‘怪’。章学诚曾对此而说：

E. 世称学于韩者……湜得其奇。今观其文……真气不足，于学盖无所得，袭于形貌以为瑰奇，不免外强中干……震于韩氏之奇而不复求其所以致奇之理……始终癖在一奇，而究不能奇也。³⁶⁾

F. 今观所作，欲学韩愈之怪怪奇奇而不能……有意奥奇，襞积字句，而无大力控搏，转成拙累……拗调涩句，刺口棘舌。³⁷⁾

E与F二文所论的主旨相同，均在说明皇甫‘无大力’而强求‘奇’，又‘究不能奇’。即，‘有意奥奇，襞积字句，而无大力控搏，转成拙累，而拗调涩句，刺口棘舌’正是皇甫文辞最大的致命伤，也是孙樵的致命伤。³⁸⁾加上皇甫以下每况

35) 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63。

36) 见于《文史通义》页261，〈皇甫持正文集书后〉。

37) 见于《文史通义》页261，〈皇甫持正文集书后〉。

愈下,导致‘自樵以降无观’³⁹⁾。因此,韩愈的古文到了晚唐五代所以不能流行,其文坛的主导地位也被骈体所取代,主要原因在于因“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⁴⁰⁾所以不能成气候,也不为人所喜。

III. 结 语

以上讨论皇甫、孙二人古文师承韩愈古文在怪奇方面的特色,而极端地趋奇走怪,结果对于晚唐古文的衰落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归纳以上探讨的结果如下:

1. 皇甫、孙二人古文成就及文论方面

- 一、二人的文论尚‘文’而不重视‘道’,脱离了古文运动的主旨。
- 二、‘怪奇’主张就是他们尚‘文’的表现。此‘怪’与‘奇’一指‘意’;一指‘词’,所指不同,而二人文论则均偏在‘词’之‘奇’上发挥,明显地表现了他们重于‘文’而轻于‘道’的特色。他们的‘怪奇’论实际上可以说是‘奇’论。此‘奇’具体而言,就是‘华’与‘难’,至于孙樵所提出的‘工’也不过是‘怪’耳,并无新意。

2. 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方面

- 一、他们号称古文家,在身负着传承韩愈以后古文的重担。但二人文才既远不及韩愈,所作‘怪奇’的文论不为人所喜。
- 二、他们尚‘文’的文论已偏离了当初古文运动的主旨;一味追求的‘奇’

38) 见于钱基博《韩愈志》〈韩门弟子记〉,此参考罗联添《韩愈研究》页251。

39) 见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此参考罗联添《韩愈研究》页251。

40) 《新唐书》卷176。

‘华’与‘难’ 又是当初古文运动所反对的对象。因为皇甫、孙二人身负传承韩愈古文的重担，而他们的古文却具有以上种种的缺陷，故使得他们的古文在韩愈以后无法保持文坛上的主导地位，终于被温、李等的骈体文所取代。

从韩柳以后古文家论文偏离儒家之道而转重‘文’的倾向逐渐明显，而这一点在皇甫、孙二人处更加显著，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就是‘始作俑者’。即，唐代韩、柳时期多尚兼儒者和文人身份的古文家，到了皇甫、孙等人处开始转重‘文’，不重重视儒圣之道，导致到了宋代文儒与学儒壁垒分明，便有了以文儒为代表的苏学和以理学家为代表的朱学的对立冲突⁴¹⁾，甚至韩欧等古文家备受程朱等理学家的猛烈攻击。可见，这些都是从皇甫、孙等人处已开始埋下了种子。

< 參考文獻 >

- 皇甫湜 撰，皇甫持正集，四库全书，第1078卷
孙樵 撰，孙可之集，四库全书，第1083卷
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华书局，香港，1984。
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北京，1985。
章学诚 著，文史通义，华世出版社，1980。
郭绍虞 著，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郭绍虞 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5。
罗联添编，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成文出版社，1978。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罗根泽 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1) 参见冷成金著，〈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 10。

- 罗联添 著, 韩愈研究, 学生书局, 1981.
 何寄澎 著, 唐宋古文新探, 大安出版社, 1990.
 成夏旺等 著, 中国文学理论史, 北京出版社, 1991.
 罗宗强 著, 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 2003.
 成松柳 著, 隋从“文以载道”到“抒写性灵”——唐宋散文的传承与拓展,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95. 6.
 冷成金 著, 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96. 10.
 罗立刚 著, 宋代“文统”观论纲,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2. 3.

<국문초록>

황보식(皇甫湜)과 손초(孫樵)는 중만당(中晚唐) 시기 한유(韓愈) 고문(古文)의 계승자를 자타가 공인하는 가운데, 주로 한유 고문의 ‘괴기(怪奇)’방면의 특징을 계승하여 더욱 극단으로 치달았다. 그 결과 당(唐) 말기 고문이 변체문에 문단의 주도적인 지위를 양보하고 쇠락하는데 있어서 결정적인 영향을 미쳤다고 볼 수 있다. 두 사람과 만당 고문운동의 쇠락과의 관계를 아래와 같이 두 가지 측면으로 나누어 정리해볼 수 있겠다.

먼저 두 사람의 고문(古文)의 성취와 고문이론 방면으로 보면: 첫째, 두 사람의 고문이론은 이미 유가의 ‘道’를 떠나서 지나치게 ‘文’에 편향되어 고문운동의 본래 취지를 벗어났다. 둘째, ‘괴기(怪奇)’에 대한 주장은 바로 그들의 ‘文’에 대한 중시를 의미하며, 이 ‘괴(怪)’와 ‘기(奇)’ 각기 ‘의(意)’와 ‘사(詞)’를 가리켜 하는 말로 가리키는 바가 다르다. 그런데, 두 사람의 이론은 주로 모두 ‘사(詞)’방면의 ‘기(奇)’에 치중하고 있어서 그들의 ‘문(文)’에 대한 편향성을 더욱 분명히 나타내고 있다. 그러므로 그들의 ‘괴기(怪奇)’론은 사실상 ‘기(奇)’론이라고 할 수 있겠다. 그리고 이 ‘기(奇)’의 구체적인 표현은 사실 바로 ‘화(華)’와 ‘난(難)’으로 집약되며, 손초(孫樵)가 언급한 ‘공(工)’은 결국 ‘괴(怪)’와 다름없으며, 별다른 새로운 의미가

없다.

다음으로 두 사람의 문단에서의 지위가 미친 영향으로 보면: 첫째, 두 사람은 당시 한유 고문(古文)의 계승자로 자처하며, 문단에서 역시 한유(韓愈) 고문의 전승자로서의 지위를 누렸지만, 두 사람의 문재(文才)는 한유에 훨씬 미치지 못했으며 황보식 이래로 내무택(來無擇), 손초 등 대를 거듭할수록 문장이나 이론 방면에서의 성취는 더욱 앞대에 못미쳐 그들이 쓰거나 주창한 '괴기(怪奇)'적인 특색은 당시 사람들의 호응을 받지 못하였다. 둘째, 그들의 '문(文)에 치우친 문론은 이미 당초 고문운동의 주지를 벗어났고, 일변도로 '기(奇)' 즉, '화(華)'와 '난(難)'만 추구하여 결국 당초 고문운동이 극력 배제하려던 것을 숭상하는 형국이 되었다. 황보식과 손초 두 사람은 한유 고문의 전승자로서 자타 공인한 터에 이와 같은 결함들을 갖게 되어 결국 당시 고문의 문단 종주로서의 지위를 유지하지 못하고 온정균(溫庭筠), 이상은(李商隱) 등이 대표하는 변체문에 그 지위를 내어주고 마는 결과에 결정적인 영향을 끼치게 되었다.

주제어: 皇甫湜, 孫樵, 古文運動, 怪奇

